

社会保障税、投资动机与海外投资

王素荣,袁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100029)

摘要:在中国国外投资流入量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长造成的东道国优势下降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使用134个国家2008—2018年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企业社会保障税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社会保障税率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企业社会保障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受投资动机的调节作用影响,在生产要素获取动机、非自然资源获取动机与非技术获取动机国家样本中更为显著;企业社会保障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存在经济体和地域差异,在G20国家、亚洲、美洲及非洲国家样本中更为显著。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基于企业社会保障税率的促进中国海外投资流入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保障税;投资动机;海外投资

中图分类号:F753/7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1)06—0112—09

一、引言

2019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亚洲各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达到5117亿美元,其中流入中国1390亿美元。从总量上看,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吸收外资国,但从2015年起中国FDI流入量增速明显放缓,与之对应的则是亚洲另一经济体东盟FDI的快速增长。三星、耐克等企业撤资中国并将生产线迁至东南亚国家,进一步说明中国传统的以资源换资金的外资策略的适用性正在降低,在经济转型期,一方面中国急需应对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对FDI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需要引进更优质的FDI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谈签税收协定降低预提税是吸引外资的有效举措,但该举措并不能直接解决要素成本价格上升对FDI的不利影响。要素成本中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有较多研究,但与劳动力成本相关的社会保障税^①对FDI的影响则较少有人研究。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法检验企业社会保障税率对FDI的影响,进而分析其作用机制,探讨政府通过降低或补贴社会保障税来促进FDI流入,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行性。

为保证从以资源换资金型低质量FDI流入,向调结构促增长的高质量FDI流入平稳转变,中国需要改善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造成的FDI流失。鉴于“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与劳动力市场的刚性特征,简单的降低员工工资并不可行。社会保障税作为要素成本的附加组成部分,若该税率的改变会导致FDI流入量变动,则降低海外投资企业社会保障税或对其进行补贴,不失为提高FDI的可行路径。基于不同动机的FDI对东道国要素价格变动的敏感性不同,本文进一步考察社会保障税率对FDI的影响受投资动机的调节作用机制,为细化政策提供依据。本文选择134个国家2008—2018年的FDI流入量与社会保障税率数据,研究社会保障税率对FDI流入量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社会保障税率对东道国FDI流入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负向影响在生产要素获取动机、非自然资源获取动机与非技术获取动机国家尤为明显。此外,本文分经济体、分地域洲际考察了社会保障税率对东道国FDI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G20国家、亚洲、非洲及美洲社会保障税率对FDI产生负向显著影响。

本文的潜在贡献在于:基于各国投资流量数据,从企业社会保障税与投资动机视角考察FDI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拓宽了“FDI区位选择”的研究思路。此外,本文从社会保障税率与海外投资关系的角度研究社会保障税,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现行企业社会保障税率偏高的背景下,论证了降低外资企业社会保障负担以增加FDI流入的可行性。

收稿日期:2020—05—25

作者简介:王素荣,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税务会计、税务筹划、国际税务;袁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税务会计、税务筹划、国际税务。

^① 世界各国对社会保障项目并没有统一的称谓,如英国、挪威等使用缴款(Contributions),美国、法国等使用税款(Tax),本文主要考虑企业强制缴纳的社会保障项目,并不对社会保障税与费做区别,此外,社会保障由个人负担及企业负担两部分组成,本文仅考虑企业负担部分。后文均以社会保障税代指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支出。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海外投资的研究相对较早,主要集中于FDI的投资动机、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在投资动机方面,Dunning(1988)将投资动机归类为获取资源、获取海外市场份额、获取效率及战略性,被学界广泛接受与应用,此后的研究多是基于此分类针对不同国家情境的拓展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对外投资(OFDI)的动因分析,刘敏等(2016)从东道国制度角度,实证检验了东道国经济和文化制度对中国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不同投资动机OFDI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和路径依赖;王永中和赵奇峰(2016)利用2004—2013年中国OFDI数据验证了中国对外投资偏好风险较高的国家并且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动机;刘凯和张文文(2018)利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基于投资动机异质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偏好。

国内外关于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包括东道国禀赋(冯伟等,2011;刘凯等,2016;吴新生和梁琦,2017)、制度环境(张一力等,2018;杨先明和王巧然,2018)、地理区位(刘荣添和林峰,2005)、税收优惠(张先锋等,2013;姚晓民和姚越,2015;沈小燕等,2011;王燕武,2008)、特殊因素(谷媛媛和邱斌,2017;梁育填等,2018),其中与要素成本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动力成本。已有研究均肯定了劳动力成本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但在影响程度、作用机制等方面则持有不同观点:Croci et al(2018)对东欧和中欧国家的FDI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单位劳动成本和总劳动成本的提高对FDI产生负向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FDI产生正向影响;冯伟等(2011)³发现劳动力成本对FDI具有门槛效应,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会降低FDI投入,劳动力成本与市场规模在共同作用于FDI的过程中存在着替代性;刘凯等(2016)¹⁰⁰发现东道国较高的健康水平、较高的中等教育普及率及较低的工资有利于吸引FDI;刘超和郑忱阳(2018)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模型框架下研究了劳动成本差异对国家间展开FDI政策竞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均衡结果依赖于市场规模、劳动力价格差异和贸易成本三者的共同作用,参与国对FDI是征税还是给予补贴取决于自身相对优势是否足够明显。

在经济后果方面,国内外研究主要聚焦于投资国对东道国的资本、技术、报酬等溢出效应,Driffield和Taylor(2000)运用英国FDI流入数据检验发现FDI会加剧东道国的工资不平衡并增加本地公司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包群和邵敏(2008)运用中国工业行业数据验证了外资有助于促进科技人员相对报酬的提高,但这种工资的溢价作用受行业特征的影响,其中企业研发投入与内资大中型企业规模两个行业特征对外资的工资溢价作用影响最大。刘晨等(2018)利用CHIP2007微观数据分析了跨国公司对不同户籍劳动者工资提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他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劳动者和流动人口工资水平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劳动者职业地位回报和人力资本回报两个方面分析了跨国公司对户籍分层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对比了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劳动者工资的提升作用。黄亚捷等(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FDI通过带动城镇就业进而拉动了城镇化过程,制造业就业对城镇化起到了正向的中介效应。

社会保障税费起源于欧洲工业社会,其实质是指定为社会保障用途的工薪税费,国内对于社会保障税费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第一,社会保障税费改革的研究。已有的研究对于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存在争议,部分学者不提倡费改税(郑秉文,2010;庞凤喜,2011),部分学者则肯定费改税的必要性,并结合中国国情为费改税提供建议(李绍光,2004;吴文芳,2014;许春淑,2013;杨宜勇和韩鑫彤,2018)。第二,社会保障税的影响与借鉴。成新轩和刘曼(2017)运用北欧国家数据发现社会保障税负水平与就业呈负相关;金英君(2011)参考西欧发展模式,丁芸和胥力伟(2014)借鉴美国税制,陈琍(2015)借鉴巴西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社会保障缴费制度优化提供建议。第三,社会保障基金的海外投资与国际合作。陆解芬(2005)对社保基金的海外投资风险与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寇国明(2007)基于文字表述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全国社保基金长期持有部分国有股、社保基金海外投资分别通过“降低代际企业所有权的转移成本”和“资本市场专门人才培育、社保基金保值增值”两条传导途径促进经济均衡增长,增加劳动者和退休人员的福利;谢勇才和王茂福(2018)总结了我国社会保障双边合作的困境与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完善对策;邓大松和杨晶(2018)在总结社会保障国际化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基于国际社会保障协定的视角考察实践中的社会保障国际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尽管已有诸多学者对社会保障和海外投资展开研究,但鲜少有学者从劳动力成本角度,考察社会保障税对海外投资流入量的影响,此外,国内学者研究多集中于中国FDI数据,对

国际FDI数据研究的相对较少且样本量较小,本文基于国际FDI数据,对上述领域进行拓展研究。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3个基本因素共同决定,在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情况下,区位优势直接决定了企业是否进行海外直接投资(Dunning,1977),具体见表1。在全球化背景下,投资国往往基于资源、市场、效率和技术获取动机进行初始投资区位的选择,在后续投资过程中,投资国技术及管理的溢出效应(Dunning,1980;许和连等,2007;夏业良和程磊,2010;黄新飞,2018)一方面会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并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劳动力成本为主导的生产要素价格;另一方面会增强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加剧两国在东道国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增加劳动力需求并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Tomohara和Takii,2011)。制造业是中国海外投资流入最多的行业,但其所占比重持续下滑(2015—2017年分别为31%、28%、25%)^②,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相对优势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一财经研究院,2018),其平均劳动成本增长速度为13.1%,已达到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的最高水平。劳动力成本包括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及缴纳给当地政府的社会保障税,由于劳动力工资的刚性特征,单纯地减少工资不具备可行性,而企业社会保障税通常以工资为基数按比例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提高会间接导致投资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减少东道国(特别是制造业为主导东道国)区位优势并最终减少东道国海外投资流入。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东道国的企业社会保障税率对投资国海外直接投资流入产生负向影响(H1)。

表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概述

优势	定义	FDI	出口	无形资产转让
所有权优势	一国企业拥有或是能获得的国外企业所没有或无法获得的特点优势,包括技术优势、金融与货币优势等	√	√	√
内部化优势	为避免不完全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将其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化而保持企业所拥有的优势	√	√	×
区位优势	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对投资者来说在投资环境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市场潜力、资源禀赋等	√	×	×

注:“√”代表具有或应用某种优势;“×”代表缺乏或丧失某种优势。

在东道国社会保障税会改变投资成本从而对FDI流入产生负向影响的逻辑框架下,投资国的投资动机差异是否会影响到社会保障税对FDI的影响程度?本文进一步从投资国投资动机差异视角,考察要素获取动机、资源获取动机、技术获取动机对社会保障税与FDI流入的差别影响。

首先,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运输能力的提升及国际贸易的繁荣,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丰富、更低廉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在制造业产品技术标准化的大趋势下,企业往往基于要素获取动机选择将生产活动转移到要素投入的来源地,从而降低成本获取高额利润。对于期望获得低廉生产要素价格的投资企业而言,更容易受到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东道国社会保障税率对FDI流入量的负向影响对要素获取动机的FDI更显著(H2)。

折衷理论认为,区位优势包含硬性因素与软性因素,硬性因素指东道国的石油、煤炭、矿产等自然资源禀赋,软性因素指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法治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无形的特征,许多企业会基于资源获取动机与技术获取动机进行FDI决策。从硬性因素考虑,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获取需要较长的勘探开采周期与较高的固定资产的投入,回报周期长且对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要求,其投资决策受更多因素制约。另外,基于能源获取动机的FDI多为国有企业或大型公司(杨先明和王巧然,2018)¹²²,具有更强的抗风险与抗成本波动能力。因此,资源获取型FDI对东道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并不敏感。从软性因素考虑,技术研发能力需要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与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保障(吴超鹏和唐葑,2016;刘思明等,2015),高科技企业出于产权保护的角度往往将研发中心保留在本国内部,FDI进入成本较高。另外,技术获取动机FDI的最终目标是将技术本土化发展,其最终消费市场通常为本土市场。因此,技术获取型FDI对东道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并不敏感。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东道国社会保障税率对FDI流入量的负向影响对非资源获取动机的FDI更显著(H3);

东道国社会保障税率对FDI流入量的负向影响对非技术获取动机的FDI更显著(H4)。

②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8—2018年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为初始样本,政府向企业征收的社会保障税率数据来源于毕马威数据库,删除缺失值后共获得134个国家和地区11年总量为1474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FDI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其他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EPS全球统计数据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为剔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模型的所有连续变量在1%的水平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参考已有文献,设定如下研究模型,由于FDI的投入会提高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提高贸易开放度、国民收入与劳动力需求,存在互为因果的可能性。因此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均取滞后一期值,以消除内生性。

$$\ln FDI_{i,t} = \alpha_0 + \alpha_1 SCT_{i,t-1} + \alpha_2 \ln GDP_{i,t-1} + \alpha_3 Trade_{i,t-1} + \alpha_4 \ln GNI_{i,t-1} + \alpha_5 Popudensity_{i,t-1} + \alpha_6 WGI_{i,t-1} + \alpha_7 \ln infrastructure_{i,t-1} + Country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α_0 表示截距项; $\alpha_1 \sim \alpha_7$ 表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Country_i$ 表示国家固定效应; $Year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 $\ln FDI_{i,t}$ 表示东道国*i*在第*t*年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资流入量,本文使用FDI流入存量 FDI_{stock} ,考虑异方差影响,对其做对数转换;解释变量 $SCT_{i,t}$ 表示*i*国政府在第*t*年向企业征收的社会保障税率,包含养老、医疗、工伤及失业等保险,不包含员工个人承担部分。

借鉴已有文献,本文引入6个主要控制变量:

市场规模 $\ln GDP$,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利润空间越大,越有利于吸引FDI(冯伟等,2011)³,各国GDP采用现价美元衡量并做对数处理。

贸易开放度 $Trade$,贸易自由度越大,越有利于吸引FDI,本文参照蔡伟贤和踪家峰(2008)的做法,以货物和商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其代理变量。

人均国民收入 $\ln GNI$,由于各国工资水平数据缺失,本文参照项本武(2009)的做法,以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工资水平的代理变量,此外,该变量也可用于衡量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该指标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衡量并做对数处理。

人口密度 $Popudensity$,人口密度越高该地区的市场需求越大,劳动力储备越多,越有利于吸引FDI(付韶军,2018)。

制度环境 WGI ,东道国的市场健全程度、法律规范程度及政府治理效率会影响投资国的投资决定(张一力等,2018)¹⁴²。本文以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ex, WGI)数据库中提供的法制程度(rule of law)作为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

基础设施 $\ln infrastructure$,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越有利于吸引FDI,鉴于数据缺失,本文使用东道国固定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代理变量。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为了反映各变量的基本情况,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ln FDI_{stock}$	1474	10.214	2.005	10.045	5.029	14.274
SCT	1474	0.148	0.100	0.127	0	0.44
$Trade$	1474	0.887	0.519	0.794	0	3.419
$\ln GDP$	1474	24.970	1.992	24.697	20.579	29.981
$\ln GNI$	1474	8.772	1.431	8.857	5.829	11.274
$\ln infrastructure$	1474	22.423	7.697	22.339	0	45.041
$Popudensity$	1474	150.879	254.724	75.936	2.640	1733.329
WGI	1474	0.052	1.030	-0.149	-2.255	2.100

由表 2 可知, FDI 存量对数的均值为 10.214, 中值为 10.045, 该变量显示海外投资流入量存在较大的国家差异。企业社会保障税率均值为 0.148, 标准差为 0.100, 最小值为 0, 即不征收社会保障税, 最大值为 45%。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国家间税率差异较大, 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税率较高。此外, 人口密度受自然资源的约束, 呈现较大的国家间差异。

为进一步反映各变量间的相关性水平,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见表 3。

表 3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ln FDI_{stock}$	SCT	$\ln GDP$	$Trade$	$\ln GNI$	$\ln infrastructure$	$Popudensity$	WGI
$\ln FDI_{stock}$		0.264***	0.878***	-0.007	0.631***	0.102***	0.159***	0.540***
SCT	0.290***		0.278***	0.077***	0.176***	0.074***	-0.006	0.066**
$\ln GDP$	0.891***	0.304***		-0.234***	0.528***	0.054*	0.109***	0.372***
$Trade$	0.146***	0.066***	-0.125***		0.234***	0.138***	0.138***	0.258***
$\ln GNI$	0.629***	0.190***	0.525***	0.286***		-0.053*	0.175***	0.825***
$\ln infrastructure$	0.179***	0.127***	0.128***	0.171***	-0.044*		-0.078***	-0.002
$Popudensity$	0.148***	-0.061**	0.004	0.461***	0.222***	0.018		0.304***
WGI	0.529***	0.076***	0.370***	0.314***	0.814***	-0.012	0.275***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左下角为皮尔逊相关系数, 右上角为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矩阵。

此外, 本文进一步计算了该模型的方程膨胀因子 VIF, 均值为 2.02。因此本文认为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二) 回归分析

首先通过 Hausman 检验及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确定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为消除模型内生性, 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取滞后一期数据。基础回归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可知, 第 1 列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企业社会保障税与海外投资流入量的回归结果, SCT 的回归系数为 -0.417, 在 10% 水平下显著。第 2 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SCT 的回归系数为 -0.345, 在 10% 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企业的海外投资流入量会受到东道国社会保障税率的影响, 政府提高企业社会保障税率, 会降低该国的海外投资吸引力从而导致 FDI 流入量减少。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将解释变量替换为二元虚拟变量 $SCTdum$, 上一年度社会保障税发生变化, $SCTdum$ 取值为 1, 不变取值为 0。第 3 列为仅将社会保障税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SCTdum$ 的回归系数为 -0.058, 在 5% 水平下显著。第 4 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SCTdum$ 的回归系数为 -0.039, 在 10% 水平下显著, 进一步验证了企业社会保障税率对海外投资流入量的负向影响。此外, 第 3 列和第 4 列的所有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东道国市场贸易开放度越高、市场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越好、法治水平越好越有利于吸引 FDI 流入, 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

FDI 决策, 特别是初始选址的决策往往是企业高管结合公司愿景的战略部署, 是不同投资动机下对各东道国异质性特征的权衡。因此, 特定变量对 FDI 的影响程度受投资动机及东道国异质性特征的影响。尽管 FDI 会受到社会保障税率的负向影响, 但这种负向影响是否会因投资动机的不同而产生变化, 变化的程度如何, 还需进一步的分析和检验。对投资动机的调节作用的实证检验结果见表 5。

表 4 社会保障税与海外直接投资

变量	因变量: $\ln FDI_{stock}$			
	(1)	(2)	(3)	(4)
SCT	-0.417* (0.241)	-0.345* (0.195)		
$SCTdum$			-0.058** (0.023)	-0.039* (0.020)
$Trade$		0.357*** (0.130)		0.394*** (0.131)
$\ln GDP$		0.373*** (0.109)		0.397*** (0.105)
$\ln GNI$		0.527*** (0.146)		0.549*** (0.133)
$\ln infrastructure$		0.012*** (0.004)		0.012*** (0.003)
$Popudensity$		0.001*** (0.000)		0.000*** (0.000)
WGI		0.241* (0.143)		0.208 (0.142)
$Cons$	10.025*** (0.039)	-4.560* (2.735)	9.821*** (0.034)	-5.459** (2.624)
国家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340	1340	1340	1340
R^2	0.340	0.498	0.411	0.557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表5 社会保障税、投资动机与海外直接投资

变量	因变量: $\ln FDI_{stock}$					
	发展中 (1)	发达 (2)	非资源获取 (3)	资源获取 (4)	非技术获取 (5)	技术获取 (6)
<i>SCT</i>	-0.587** (0.248)	-0.064 (1.821)	-0.394* (0.198)	-0.204 (0.350)	-0.771** (0.294)	-0.262 (0.643)
<i>Trade</i>	0.518*** (0.187)	0.294 (0.237)	0.273 (0.240)	0.476*** (0.150)	0.590*** (0.205)	0.275 (0.209)
$\ln GDP$	0.238* (0.124)	0.725*** (0.167)	0.759*** (0.209)	0.228** (0.114)	0.164 (0.132)	0.757*** (0.122)
$\ln GNI$	0.485*** (0.173)	0.267 (0.291)	0.116 (0.257)	0.707*** (0.245)	0.525*** (0.191)	0.142 (0.206)
$\ln infrastructure$	0.011*** (0.004)	-0.008 (0.008)	-0.000 (0.005)	0.015*** (0.004)	0.011*** (0.004)	-0.004 (0.006)
<i>Popdensity</i>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1)	0.001*** (0.000)
<i>WGI</i>	0.307* (0.159)	-0.068 (0.159)	0.217 (0.228)	0.238 (0.184)	0.269 (0.167)	0.093 (0.109)
<i>Cons</i>	-0.951 (3.289)	-10.335* (5.327)	-10.039* (4.966)	-2.742 (3.157)	0.301 (3.541)	-10.065*** (3.227)
国家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999	329	693	635	879	449
R^2	0.545	0.407	0.496	0.533	0.565	0.486
<i>P</i>	0.000***		0.000***		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最后一列*P*值为组间差异性检验*P*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表5第(1)~第(2)列为生产要素获取动机对社会保障税率与FDI流入量之间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本文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经济体的划分为依据,将东道国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③。该分组的内在逻辑是发展中经济体生产要素价格低。因此,相较于对发达国家的FDI,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更有可能基于要素获取动机。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保障税率*SCT*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发达经济体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进一步对两组中*SCT*变量的系数进行了组间差异性检验, $P=0.000$,在1%水平上显著,这验证了H2:东道国社会保障税率对海外直接投资流入的负向影响对要素获取动机的FDI更显著。

表5第(3)~第(4)列为东道国资源禀赋对社会保障税率与FDI流入量之间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本文以东道国燃料、矿物及金属的出口额占货物出口额的比重作为东道国资源禀赋的代理变量,如果东道国*Resource*大于该变量中位数(0.154)水平,划分为资源丰富组,赋值为1,反之则为资源匮乏组,赋值为0,对资源丰富组国家的FDI投入更可能基于自然资源攫取动机。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保障税率*SCT*在资源匮乏组中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资源丰富组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进一步对两组中*SCT*变量的系数进行了组间差异性检验, P 值为0.000,在1%水平上显著,这验证了H3:社会保障税率对FDI流入量的负向影响对非资源获取动机的FDI更显著。

表5第(5)~第(6)列为技术获取动机对社会保障税率与FDI流入量之间关系的影响回归结果。本文参照吴先明和纪玉惠(2016),刘凯和张文文(2018)⁵⁹的做法,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技术创新指标(*innovation capacity*)为分组依据。技术创新指标是考虑了各国劳动力多样性、科学发表数量、专利申请数量、研发支出、商标申请、著名科研机构指数等因素综合得到的指标,分值在0~100之间,分值越高技术创新能力越高。对高技术创新能力国家的FDI更有可能基于技术获取动机。如果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得分大于该变量中位数(42.5)水平,划分为技术获取动机组,反之则为非技术获取动机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保障税*SCT*在非技术获取动机组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技术获取动机组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对两组中*SCT*变量的系数进行组间差异性检验, $P=0.000$,在1%水平上显著,这验证了H4:即东道国社会保障税率对海外直接投资流入的负向影响在非技术获取动机的FDI更显著。

(三)进一步研究

一方面,FDI区位选择可能受国家政策影响,如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增投资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4.8%,占同期总额的12.4%;另一方,由于交通、文化的制约,FDI区位选择也会有一定的地理集聚。因此,本文以主要经济体及大洲为分组依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回归检验,主要经济体的社会保障税与海外直接投资回归结果见表6,各洲的社会保障税与海外直接投资回归结果见表7。

③ 以IMF的划分为依据,本文样本中的发达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共32个国家,其余样本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

表6 主要经济体的社会保障税与海外直接投资

变量	因变量: $\ln FDI_{stock}$			
	“一带一路”	欧盟	东盟	G20
	(1)	(2)	(3)	(4)
<i>SCT</i>	-0.319(0.291)	0.187(0.731)	-1.350(0.779)	-0.927*** (0.301)
<i>Trade</i>	0.260** (0.121)	0.337(0.250)	0.121(0.189)	0.321(0.208)
$\ln GDP$	0.322(0.209)	0.474* (0.273)	0.640*** (0.188)	0.429** (0.165)
$\ln GNI$	0.146(0.201)	0.414(0.280)	0.619(0.420)	0.498* (0.251)
<i>lninfrastructure</i>	0.005(0.004)	0.000(0.009)	0.006(0.004)	0.003(0.007)
<i>Popudensity</i>	0.000*** (0.000)	0.001(0.002)	0.000(0.000)	0.001(0.001)
<i>WGI</i>	0.426* (0.234)	-0.066(0.200)	0.005(0.115)	0.026(0.120)
<i>Cons</i>	0.237(5.725)	-5.391(7.574)	-11.230*** (3.138)	-4.855(4.056)
国家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59	280	100	430
R^2	0.466	0.302	0.928	0.41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由表6可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东盟国家社会保障税对FDI的影响为负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由于相应区域国家受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较大,来自中国的投资额明显增加,削弱了企业社会保障税率对FDI流入额的影响。此外,在欧盟国家社会保障税对FDI的影响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由于欧盟多为发达国家且对欧盟的投资多基于技术获取动机,其回归结果与前述研究假设一致。在G20国家*SCT*回归系数为-0.927,在1%水平下显著,这是由于G20成员国涵盖面广兼顾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国政治经济均较稳定,2008—2018年每年G20国家的海外投资流入额均占全球总额的60%以上^④,具有一定的全球代表性,其回归结果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排除了经济政治不稳定国家的极端值影响,与主回归结果一致。

表7 各洲的社会保障税与海外直接投资

变量	因变量: $\ln FDI_{stock}$			
	亚洲	非洲	欧洲	美洲
	(1)	(2)	(3)	(4)
<i>SCT</i>	-0.396** (0.170)	-1.492** (0.680)	0.038(0.246)	-1.282** (0.586)
<i>Trade</i>	0.302*** (0.072)	0.971*** (0.308)	0.438(0.295)	-0.095(0.211)
$\ln GDP$	0.588*** (0.146)	0.163(0.156)	0.004(0.323)	0.162(0.223)
$\ln GNI$	0.359** (0.136)	0.161(0.333)	0.354(0.271)	1.669** (0.593)
<i>lninfrastructure</i>	0.004(0.003)	0.011* (0.006)	0.003(0.010)	-0.006(0.008)
<i>Popudensity</i>	0.000*** (0.000)	0.007** (0.003)	0.003(0.002)	0.014(0.010)
<i>WGI</i>	0.126(0.100)	0.209(0.215)	0.623(0.414)	0.242(0.183)
<i>Cons</i>	-8.336** (3.131)	2.194(4.503)	6.043(8.188)	-9.557** (4.445)
国家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19	320	380	269
R^2	0.779	0.602	0.179	0.78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六、研究结论分析与政策建议

在全球化背景下,海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家间资本、技术、知识的流通。投资国将资本、技术输出以换取东道国的资源、生产要素、垄断优势,东道国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与补贴吸引海外投资以获取投资国的资本投入及技术溢出效应。在这种流通过程中,企业社会保障税的变化会改变东道国区位优势,从而影响投资国的投资决策。本文以134个国家和地区2008—2018年11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企业社会保障税对FDI流入量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社会保障税对FDI产生负向影响,该影响受投资国投资动机的调节作用,即社会保障税对于生产要素获取动机的FDI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较于资源获取动机和技术获取动机,社保税对FDI的负向影响仅在非资源获取动机和非技术获取动机的FDI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社会保

④ 2008—2018年G20国家FDI流入额占全球FDI流入额的比重分别为66.46%、55.91%、57.55%、55.38%、57.35%、66.94%、57.02%、54.12%、63.41%、55.42%、65.87%,数据来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https://data.oecd.org/fdi/fdi-stocks.htm#indicator-chart>整理。

障税对FDI的负向影响存在组织和地域差异,即在G20、亚洲、非洲和美洲负向影响显著。

为了反映我国社会保障方面的税负水平,将我国社会保障税与各经济体比较。2018年各经济体和各洲的社会保障税情况见表8。

由表8可知,按经济体划分欧盟平均税率最高,为21.89%,东盟平均税率仅为9.21%,按大洲划分,亚洲平均税率仅次于欧洲,为15.23%,而中国税率在亚洲为最高水平为28.75%,高出亚洲平均水平13.52%,将近一倍,以上数据进一步说明目前中国企业社会保障税负担较重,降低企业社保税负以增加FDI从操作层面存在可行空间。

针对中国较高社会保障税负,以本文实证结论为依据,提出政策建议如下:第一,为吸引外资,可以适当降低企业社会保障税率,降低企业负担,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区位优势降低。第二,基于海外投资动机的调节机制,分行业制定不同等级的社会保障税率优惠幅度,加大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社保优惠幅度,以期取得较好的引进外资效果。第三,开展社会保障国际合作,谈签双边社会保障协定,保护跨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提高跨国公司的海外竞争力。

表8 2018年社会保障税率分类对比表

分类	最低值		最高值		平均税率(%)	
	比例(%)	国家	比例(%)	国家		
按经济体分类	G20	1	南非	30.2	俄罗斯	17.75
	欧盟	0	丹麦	34	捷克	21.89
	东盟	5.2	泰国	23	越南	9.21
按地域分类	亚洲	5.2	泰国	28.75	中国	15.23
	欧洲	0	丹麦	34	捷克	23.77
	美洲	4.5	智利	28.8	巴西	13.4
	非洲	1	南非	26	埃及、阿尔及利亚	11.82
	大洋洲	3	新西兰	10	斐济	7.18

注:中国的社会保障税28.75%,不包括住房公积金12%。

参考文献

- [1] 包群,邵敏,2008.外商投资与东道国工资差异:基于我国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5):46-54.
- [2] 蔡伟贤,踪家峰,2008.外商投资、贸易开放度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J].财经研究(8):88-96.
- [3] 陈琍,2015.巴西中等收入阶段税收制度和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10):90-95.
- [4] 成新轩,刘曼,2017.北欧社会保障税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38(5):47-53.
- [5] 邓大松,杨晶,2018.社会保障国际化:研究缘起、典型样态与路径选择[J].东岳论丛,39(2):42-48.
- [6] 第一财经研究院,2018.中国与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报告[R].博鳌:博鳌亚洲论坛.
- [7] 丁芸,胥力伟,2014.美国社会保障税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税收(12):18-22.
- [8] 冯伟,邵军,徐康宁,2011.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我国1990—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6):3-20.
- [9] 付韶军,2018.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国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1):70-78.
- [10] 谷媛媛,邱斌,2017.来华留学教育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4):83-94.
- [11] 黄新飞,2018.国际贸易、FDI和国际R&D溢出——基于中国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8(2):187-196.
- [12] 黄亚捷,闫雪凌,马超,2018.FDI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基于劳动力就业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8(4):185-195.
- [13] 金英君,2011.西欧社会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启示[J].理论探索(5):98-102.
- [14] 寇国明,2007.“国有股划拨社保基金”及“社保基金海外投资”政策的经济效应——基于文字表述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6):19-23.
- [15] 李绍光,2004.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制度优化[J].经济研究(8):48-56.
- [16] 梁育填,周政可,刘逸,2018.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J].地理学报,73(8):1449-1461.
- [17] 刘超,郑沈阳,2018.劳动成本、国际税收竞争与外资选址[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6):102-113.
- [18] 刘晨,葛顺奇,罗伟,2018.FDI、异质性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工资提升[J].国际贸易问题(1):112-122.
- [19] 刘凯,张文文,201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制度偏好吗——基于投资动机异质视角[J].宏观经济研究(7):59-75.
- [20] 刘凯,朱亚卓,占少梅,2016.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与FDI区位选择[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5):100-112.
- [21] 刘敏,刘金山,李雨培,2016.母国投资动机、东道国制度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经济问题探索(8):100-112.
- [22] 刘荣添,林峰,2005.我国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差异因素的Panel Data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7):25-34.
- [23] 刘思明,侯鹏,赵彦云,2015.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工业创新能力——来自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2(3):40-57.
- [24] 陆解芬,2005.社会保障基金海外投资风险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6):82-85.

- [25] 庞凤喜, 2011. 社会保障缴款“税”“费”形式选择中若干问题辨析——兼与郑秉文研究员商榷[J]. 财政研究(10): 68-71.
- [26] 沈小燕, 王跃堂, 杨志进, 2011.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来自地级城市的经验数据[J]. 当代财经(12): 81-93.
- [27] 王燕武, 2008. 国际税收协定与FDI相关性研究综述[J]. 国际经贸探索(7): 74-78.
- [28] 王永中, 赵奇锋, 2016. 风险偏好、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 金融评论, 8(4): 1-17.
- [29] 吴超鹏, 唐葑, 2016.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研究, 51(11): 125-139.
- [30] 吴文芳, 2014. 社会保障费与税之关系的基础理论探究[J]. 税务研究(7): 86-89.
- [31] 吴先明, 纪玉惠, 2016. 决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因素分析[J]. 科学决策(10): 1-19.
- [32] 吴新生, 梁琦, 2017. 贸易自由化与FDI区位选择——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6): 571-579.
- [33] 夏业良, 程磊, 2010.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2002—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7): 55-65.
- [34] 项本武, 2009.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 财贸经济(4): 77-82.
- [35] 谢勇才, 王茂福, 2018. 我国社会保障双边合作的主要困境及对策研究[J]. 中国软科学(7): 49-62.
- [36] 许春淑, 2013. 税收公平视角下的社会保障税制设计原则[J]. 税务研究(7): 88-90.
- [37] 许和连, 魏颖琦, 赖明勇, 等, 2007. 外商直接投资的后向链接溢出效应研究[J]. 管理世界(4): 24-31.
- [38] 杨先明, 王巧然, 2018. 中国企业海外能源投资的区位导向: 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抑或制度距离?[J]. 经济与管理研究, 39(6): 122-134.
- [39] 杨宜勇, 韩鑫彤, 2018. 关于中国建立社会保障税的政策构想[J]. 税务研究(9): 60-66.
- [40] 姚晓民, 姚越, 2015. 所得差距、经济整合与FDI[J]. 湖南社会科学(3): 136-141.
- [41] 张先锋, 卢丹, 张燕, 2013. 税收优惠、社会性支出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的研究[J]. 经济经纬(5): 53-58.
- [42] 张一力, 周康, 张俊森, 2018. 海外市场、制度环境与本土集聚[J]. 经济研究, 53(10): 142-157.
- [43] 郑秉文, 2010. 费改税不符合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战略取向[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4(5): 23-30.
- [44] CROCI T, LANDI M, MARINI P, 2008. Labour costs and FDI flows into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Structural Change & Economic Dynamics*, 19(1): 17-37.
- [45] DRIFFIELD N, TAYLOR K, 2000. FDI and the labour market: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6(3): 90-103.
- [46] DUNNING J H,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J].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1023: 203-205.
- [47] DUNNING J H, 1980. 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ome empirical tes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1(1): 9-31.
- [48] DUNNING J H, 1988.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1): 1-31.
- [49] TOMOHARA A, TAKII S, 2011. Does globalization benefit developing countries? Effects of FDI on local wages[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33(3): 511-521.

Social Security Tax, Investment Motiv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ang Surong, Yuan Fang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low growth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how to cope with the declining host country's advantage caused by the rapid growth of labor costs is an urgent issue to be studied. A 11-year equilibrium panel data of 134 countries from 2008 to 2018 is used and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is adopt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tax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tax rat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FDI. The negative impact is moderated by investment motivation, which means the negative impact is only significant in the sample of countries with factors of production acquisition motivation, non-natural resource acquisition motivation and non-technological acquisition motivation. Further,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tax on FDI varies across economies and geographies, which is only significant in the sample of G20, Asian, Americ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inflow of FDI in China based on the decrease of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tax rate or tax subsidy.

Keywords: social security tax; investment motivation; overseas investment